

更感兴趣,“发愿终身作记者”,以文章报国。

张季鸾先在于右任创办的《民呼日报》、《民吁日报》上写稿。回国后,协助于右任创办《民立报》。

初登报坛、崭露头角的张季鸾即一鸣惊人。他写的社论,笔锋常带感情,文(言)白(话)交融创造了一种评论中带新闻的新的报章言论文体。当年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任大总统时的就职宣言即为张季鸾起草。

张季鸾不仅文才出众,而人品与操守尤为人敬仰。袁世凯指使凶手暗杀宋教仁后,以恐怖手段压制北京各报,不准披露。张季鸾毫不畏惧,以通信形式发往上海《民立报》。接着又揭露袁世凯向外国银行团秘密借款,全国为之震动。张季鸾被捕入“死狱”,经多方营救才出狱(同时被捕的曹成甫病死狱中)。张出狱后,即著文揭露袁党黑暗统治。后军阀段祺瑞执政,为扩充个人武力,不惜

出卖主权,以胶济铁路为抵押,秘密向日本借款。张季鸾在《中华新报》揭露此消息,又一次被捕,历半月余才恢复自由。两次入狱,说明张季鸾铁骨铮铮,有胆有识。

1926年9月,张季鸾与吴鼎昌、胡政之3人合作接办《大公报》(1902年创刊),以全新面貌出现,提出八字基本方针: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,主张言论独立,不盲从,更不受任何方面收买。张季鸾任总编,主持笔政。从此开创了新记《大公报》20余年的局面。

## “西安事变”——张蒋缔交的契机

蒋介石与张季鸾缔交,1936年的“西安事变”是个契机。

当时《大公报》在天津、上海两地出版。“西安事变”发生后的次日(12月13日),张季鸾得

## 不在朝不入幕以文干政

蒋介石的文人幕僚里,有不少人都出身于新闻记者。

“文胆”陈布雷进入政治舞台就从办报开始,先后办过《天铎报》、《四明日报》、《商报》。他热爱新闻事业。据说,1948年他自杀前痛悔“不该从政,应该从事新闻事业”。除陈布雷外,邵力子、叶楚伦先办《民国日报》,后再从政。

这些人弃新闻工作而入蒋介石幕后,即成上下级关系,谏诤就有了约束,不象办报时可以畅所欲言。

在新闻圈内,蒋介石也有堪称知己的朋友。《大公报》总编辑张季鸾就是一个。张季鸾既不在朝也始终未入幕。他是通过笔下的文章,臧否国事,筹谋献策,往往被蒋介石所采纳。如1937年抗战初期,张季鸾力主组织“国防最高会议”,团结各党各派;释放当时在押的沈钧儒、邹韬奋、章乃器等救国会“七君子”,并与之合作共同抗日,这都是蒋介石所听从。据说能直接进入蒋介石私邸无需通报者为数寥寥,而张季鸾就是一个。

## 初登报坛一鸣惊人 两次入狱铁骨铮铮

张季鸾(1886—1941),陕西榆林人。早年留学日本,对日本的报纸产生兴趣。同时结识留日学生吴鼎昌(达诠)、胡霖(政之),后与此两人创办《大公报》,这是后话。在东京时,张季鸾广博的学识,汪洋恣肆的文笔,在留日学生中颇有盛名。留日的陕籍名人井勿幕、康心孚,创办鼓吹革命的刊物《夏声》就请张季鸾任编辑。

1906年冬,于右任到东京,访谒孙中山,参加同盟会,曾和井勿幕、张季鸾谈起创办报纸,并向他们约稿。果然次年于右任创办的《神州日报》问世,并独放异彩。张季鸾自此对新闻事业

# 张季鸾与蒋介石

## 的特殊交往

李伟

## ·人物春秋·

到了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,说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于昨晚在西安发动兵谏,扣留了蒋介石,要蒋停止内战,联共抗日。

这时,张季鸾在《大公报》上海馆。面对这突发事件如何确定报纸的言论态度,并非易事。张季鸾冷静作了思考,对编辑部同仁说:“我要庄严地说几句话,团结为至要,不能遗人口实,让敌人乘机大举入侵,各个击破。”说罢,他进了自己的小房间去写社论。中间不时出来看看有否收到外国电讯,直到深夜,社论写成。

发在翌日(14日)的《大公报》社论《西安事变之善后》,事变刚发生就提出“善后”,自然令人惊异。表明张季鸾见解之独特,他不想对主其事者责骂一番逞一时之快,他想到的是事变的如何结局。

社论开头说:“12日西安发生大事变,而电讯不通,莫知详况,各界惊忧,达于极点。兹抒所怀,幸全国爱国人士留意焉。”接着指出:“一,解决时局,避免分崩,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。陕事主动者倘拒绝此意,使政府领袖不能行使职权,甚或加以不测之危害,是则须负甘心祸国之责任。不论其所持理由如何,凡中国良知纯洁之国民,应一致反对之。”接着又说:“夫国家必须统一,统一必须领袖,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底定及领袖之形成岂易事哉!10年来国家以无量牺牲,无量代价,仅换得此局面,倘再倒退,将至自亡……故吾人以为公私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,倘其有济,则劝政府必须宽大处理,一概不咎,国家问题,从长计议……”

接着在第二天,张季鸾又写了第二篇社论《再论西安事变》。文章详细分析国家所处的地位与形势,劝西安当局早日回头。文中沉痛地说:“夫毕竟愿做破碎之西班牙,自残以尽,仰欲保持完整之中国,自力更生,公意俱在,不问可知。”

两篇社论的要点都是“国家必须统一”,避免内战,不做“破碎之西班牙,自残以尽”,“救蒋第一”,对张杨建议“政府宽大处理,一概不咎。”这些观点新颖独到,与那些一片辱骂,力主杀伐的报纸成鲜明对比。

### 反对讨伐救人第一 预言兑现喜从中来

“西安事变”发生后,南京城中演出一场戏

中戏。亲日派以何应钦为首,力主讨伐,阴谋乘机发动内战,讨伐军开抵潼关,派飞机轰炸西安。别有用心的汪精卫,时在欧洲,匆匆赶回来,企图火中取栗。只有宋美龄、孔祥熙、宋子文等人,反对何应钦主张,力倡和平解决,救人第一。这正与张季鸾观点相符。

从12月14日到25日蒋介石离西安,张季鸾除写前述两篇社论外,一下写了《望张杨觉悟》、《讨伐令下之后》、《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》、《祖国利益高于一切》、《国家进步之表现》、《中国不做西班牙》、《共同维系向心力》等社论。各篇都贯穿一个中心:不主张讨伐,救人第一。

在中国新闻史上,以飞机散发报纸社论,就以张季鸾的社论为始。张季鸾在《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》里写道:“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信快带到西安,请西安大家看看,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……我们期待3天内就要有喜讯,立等着给全国同胞报喜。”果然宋美龄主持的航委会,当天就派出飞机,带着这张报(不是全份)40万张,飞到西安上空散发。这是中国报纸的创举。

在中共的大力斡旋下,“西安事变”得到和平解决。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的八项条件,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。12月25日,消息传到上海,当晚张季鸾写了社论《国民良知的大胜利》。开头就说:“昨晚从6时半以后,全国各大小都市欢声雷动,爆竹齐鸣,实现了狂欢之夜。昨天又恰是云南起义再造共和的纪念日,我们与国民同庆之余,愿先简单的贡献几句祝词……西安事变发生,我们于忧虑、愤慨中实在抱着一种信念,以为一定能达到逢凶化吉。我们18日给西安军人的公开信中,说明期待3天以内能给全国同胞道喜。现在,虽然期迟了3天,但果然能达到给全国报喜的愿望。我们的欣喜不问可知了。”可以看出张季鸾对自己的预言兑现的喜悦之情。

### 一热一冷 尊鄙立现

蒋介石回到南京,即住进中央医院养伤。自然文武百官前去慰问。其中有《中央日报》总编辑程沧波。

程沧波恭敬虔诚地致了一番慰问词,蒋介石目光旁视,冷冷地说:“我活着回来了,没有死!”听着这几句话,程沧波面红耳赤,惶惶然而退。

原来,在蒋介石被囚期间,《中央日报》摆出官方报纸的架势,连篇累牍发表社论,主张对叛乱者应严加讨伐,并提议派飞机去西安轰炸。如真的去轰炸,难保蒋介石不被波及,故蒋说“我活着回来了”,明明是讽刺程沧波。

当张季鸾从上海去南京慰问时,备受蒋介石的礼遇,“宾主相谈甚欢”。对蒋介石的腰伤,张季鸾还推荐刘湘幕下的刘神仙医治,后来虽未请刘神仙,也足见蒋对张的态度。

## 为了国是知无不言

从此,蒋介石与张季鸾缔交。以后,蒋每有重大国是都请张季鸾到南京商量。张季鸾也以国土报之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成为未入幕之策士。而《大公报》也就成为蒋每天必读之物,该报的社论观点常常影响蒋的施政。

依附蒋的青年党的党魁左舜生,曾对人说,张季鸾深知蒋的为人和想法,在头脑中将其推前一步,写为社论,蒋觉得有道理,往往照此实行,因而《大公报》常得风气之先,蒋也因此收“尊重舆论”之誉。

## 士为知己 不为名利 口碑 极佳 赞誉纷纷

作为一介文人的张季鸾,品格与操守也为当时报人所矜式。他和蒋介石缔交后,《大公报》的言论也有袒蒋之处,甚至被讥为“小骂大帮忙”,但细究起来,张并非为名为利,至多出于“士为知己”之念。在他主《大公报》时期,该报也确实按“不党”、“不卖”的八字方针办事的,未收过官方津贴。在他死后,《大公报》背离八字方针,收过国民党的20万美金官价外汇,而他“墓木已拱”了。

出自个人的口碑,对张季鸾之评并不错。1946年,沈衡山(钩儒)先生,曾对出身于《大公报》后为《文汇报》总编的徐铸成说:“季鸾是一个好人,对我来说,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老朋友。记得我们出狱以后(即“救国会七君子被囚案”——笔者),即被接至南京,参加最高国防会谈,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我们,还关心我们和蒋谈话的结果。”而“七君子”之被

释,张季鸾起了很大作用。

对张季鸾办报的才能,周恩来总理说过一段话。《大公报》名记者徐盈曾向徐铸成转述。周恩来说:“作总编辑要象张季鸾那样,有优哉游哉的气概,如腾龙飞虎,游刃有余。足见评价之高。”

1941年6月9日,张季鸾病逝于重庆。中共负责人在悼词中,称其为“文坛巨擘,报界宗师,”并肯定其“坚持团结抗战,功在国家”,“谋国之正,尤为士林所矜式。”

## 蒋对报人的真正态度

应该说,蒋介石对张季鸾的态度,只是一个异数,并非常例。蒋对张的尊重,只是由于张主《大公报》笔政时的言论态度符合蒋的利益,蒋才能“礼贤下士”与“尊重舆论”。

张季鸾去世后,继掌笔政的是王芸生。言论态度与张在世时没有多大改变。但有时也会稍有越轨。这时蒋介石就不能宽容了。

1943年2月,《大公报》曾受停刊3天的处分。

事情的起因是:1942年,河南发生空前大旱灾。灾民嗷嗷待哺之际,国民党政府仍向灾民勒逼征粮。《大公报》重庆版于1943年2月1日发该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出的《豫灾实录》的通信,揭露河南天灾人祸的深重。王芸生根据这篇通信,对比重庆情况,颇动感情地写了题为《看重庆,念中原!》的社论,发于2月2日《大公报》。文中有“饿死的暴骨失肉,逃亡的扶老携幼,妻离子散,挤人丛,挨棍打,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。吃杂草的毒发而死,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,妻子运到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几斗粮食……灾荒如此,粮课依然……”社论发表当晚,军委会就限令该报从2月3日至5日停刊3天。

这事还有余波。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邀王芸生访问美国。国民党政府已同意,发了护照,也买到外汇,蒋介石与宋美龄并为王饯了行。飞机行期也已定。报纸停刊同时,忽接通知:“委员长通知,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。”

这就说明了蒋介石对报人对言论的真正态度。